



陈文斌 武国友 ◎主编

中国共产党 历史专题大事纵览

从一大到十八大

第二卷(1949—1978)

红旗出版社



陈文斌 武国友 ©主编

中国共产党 历史专题大事纵览

从一大到十八大

第二卷(1949—1978)

本卷主编 卜伟华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历史专题大事纵览：从一大到十八大·第2卷 / 陈文斌，武国友主编。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051-2596-4

I. ①中… II. ①陈… ②武…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大事记—1949~1978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2332号

书 名 中国共产党历史专题大事纵览：从一大到十八大（第2卷）

主 编 陈文斌 武国友

出 品 人 高海浩

责任校对 陈华丽 舒 丽

总 监 制 徐永新

封面设计 红汇·一品

责任编辑 廖晓文 郅军席

版式设计 涂维波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51631925

E-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64024637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16

总 字 数 4134千字

总 印 张 133.75

字 数 1097千字（第2卷）

印 张 35.5（第2卷）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2013年3月河北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1-2596-4

定 价 998.00元（全三卷）

导 言

本卷记述的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这段历时28年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49年10月—1956年9月）。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制度改革，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面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1953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经济、政治条件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动员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总路线规定的任务而奋斗。中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推进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在这期间，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奉行和平外交方针，初步争取到一个有利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到1956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建设进展顺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56年9月—1966年5月）。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党内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不同意见。毛泽东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发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在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造成了严重后果。觉察失误后，党作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并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错误虽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但在当时尚未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因此，

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顺利完成。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宏伟蓝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1966年5月，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由文化领域批判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被称作“政治大革命”。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只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使全国人民艰苦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社会主义中国偏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同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潮流相脱节，拉大了同一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虽然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林彪、江青集团利用这种错误煽动极左思潮导致的社会动乱严重发展并长期持续，虽然运动初期曾有大批学生、干部、群众响应号召狂热地投身其中，但是，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尖端科学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我国的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

第四阶段：徘徊中前进和向改革开放新时期转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党和国家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实现历史性转折，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重要阶段。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各级党组织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积极展开了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进行了拨乱反正。展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党、全国空前的思想解放，推动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取得很大成绩，为酝酿改革开放、实现历史转折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结束了徘徊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目 录

导言	1
党的全国会议和中央会议	001
党中央召开的部门会议和地方会议	027
省、直辖市、自治区党代会	030
总任务·总纲领·总路线·总方针政策	032
思想·理论和宣传工作	034
组织工作·党员·干部教育	046
纪律检查工作·监察工作	057
整风和勤政廉政建设	060
军事工作·军事斗争和国家安全工作	062
统一战线工作	077
民族工作	082
宗教工作	088
党际关系·外事工作	089
政权建设·政治体制	12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	1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133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	137
法制·公安·司法·监察工作	152
青年团·少先队·青少年工作	156
职工工作	159
妇女儿童工作	163

香港·澳门·台湾·侨务工作·····	164
知识分子工作·····	167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	169
经济管理·经济体制·····	172
经济计划·统计工作·····	180
财政·金融·税收·····	200
商业·市场·物价·····	210
进出口·对外贸易·····	219
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	221
农村工作·农业（农、林、牧、副、渔）生产·····	236
水利·····	251
教育·科学技术·····	256
文化·····	287
卫生·医药·环境保护·····	297
体育·····	298
新闻·出版·····	299
劳动·人事·工资·社会保障·····	301
民政工作·抗灾救灾·····	305
人口·计划生育·····	306
信访工作与群发性事件·····	307
工作视察与调查研究·····	309
庆典·纪念活动·····	315
解放国土·····	318
镇压反革命·····	319
抗美援朝·····	321
土地改革·····	326
实施新民主主义政策·恢复国民经济·····	328
统购统销·计划供应·····	330
“三反”·“五反”·····	333

农业合作化	338
手工业合作化	344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48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	355
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	357
高饶事件	359
反右派运动和对右派分子的政策	361
大跃进运动	368
人民公社化运动	380
人民公社的整顿	382
城市工作·城市人民公社的成立和解体	387
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	388
三年饥荒和经济困难	394
下放干部·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	398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面调整	404
农村“四清”运动·城市“五反”运动	413
“文革”前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	422
中苏论战	425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开展	428
红卫兵运动·大串连	456
林彪、江青集团打击迫害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	459
迫害刘少奇	465
对“文革”的抵制和斗争	467
造反夺权和派性斗争	470
揪“叛徒”运动	477
“抓革命，促生产”·维持生产秩序、社会秩序	478
工宣队·军宣队·“三支两军”	484
知青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工厂	489
落实政策·平反冤案	491

林彪集团及其覆灭·批陈整风与批林整风	493
1975年全面整顿	502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508
悼念周恩来与天安门事件	513
批林批孔与评法批儒	516
“四人帮”集团的覆灭	524
揭批“四人帮”	529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532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534
“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	537
人物	540
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550

党的全国会议和中央会议

1950年6月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陈云在任弼时休假期间参加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组成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

6月6日至9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并有各省市党委书记及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43人。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另外，还有三个专题报告：薄一波关于税收问题的报告，安子文关于党的组织情况及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胡乔木关于整党工作的报告。几个大行政区负责人也作了报告。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毛泽东的报告提出，全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指出，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了创造上述三个条件，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做好八项工作：(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复员一部分军队，整编行政机构。(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及灾民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6)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克服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在

全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他指出：“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在缓和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所谓“有所不同”，就是国营经济是处在领导地位，它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不同，要加以区别。所谓“一视同仁”，就是要按《共同纲领》办事，公私一样看待。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毛泽东指出，缓和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就是缓和了同工人阶级的紧张关系。私人工厂能开工，工人即不致失业。

在党派关系方面，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也应当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无产阶级的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是有所不同的，但在待遇上，要“一视同仁”。

在团结知识分子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改造知识分子，不要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在民族关系方面，毛泽东指出，民族工作要谨慎地做，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要训练少数民族干部。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指出，整风也是为了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缓和阶级间的紧张空气。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业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1951年2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向党内通报：中央于2月中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八个问题：(1)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2)必须在

全国继续推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3) 农忙时，土改一律停一下，争取今年丰收。积极创造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劝告农民以不采用非刑拷打为有利。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4) 镇压反革命要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注意“中层”（镇压反革命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外层”，是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5) 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在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6) 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及各中央局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整党时，首先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清洗出去，然后将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和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7) 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少数民族工作的中心是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8) 冬季进行一次整风，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

1953年2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在10年到15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6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毛泽东指出，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他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1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在6月15日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宣传部着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7月29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讲话中谈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在总进攻中有部分退却，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应该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但

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有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对私营企业在所有权方面要一视同仁，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予照顾。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毛泽东还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主要的、基本的、起领导作用的，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12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休假一段时间，这期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后，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议还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修改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

1954年1月7日 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可。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1月22日 毛泽东在杭州致电刘少奇：“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

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周恩来同志或再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2月6日至10日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正式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因病因事缺席9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52人。毛泽东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全会。会上，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发了言。经过详细讨论，全会作出决议：（1）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2）批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3）批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1953年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全会一致通过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2月10日，刘少奇作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全会结束后，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向干部和党员认真传达并组织学习全会的三个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在讨论中，必须联系自己在领导方面的缺点加以检讨，特别是对于有关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制度的检查。

1955年1月15日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汇报，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周恩来强调，一定要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会后，批准在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不久，又批准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物理系。

3月21日至31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

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并为会议作结论。会议听取陈云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和会议代表100人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发言。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号召全党在中央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以代替原有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他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

4月4日 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举行。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三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选。全会委托中央政治局根据全国代表会议的讨论，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适当的修改，然后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予以审议和通过。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4日至11日 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到会的中央委员38人，候补中央委员25人。列席会议的有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委书记，党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388人。会议的议程是：（1）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2）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

议草案的说明》，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会上作了发言，另有167人作了书面发言。在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随后，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全会还基本上通过了在试行中经过多次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草案，决定提交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错误地批评了党内在合作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并强调，彻底地批判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决议》认为，我们有些人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们提出了“坚决收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决议对合作化运动作了新的规划：（1）在互助合作运动比较先进的地方，到1957年春季以前合作社发展到当地农户的70%~80%，即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2）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大体上可以在1958年春季以前先后基本上实行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3）互助组运动基础比较薄弱，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还很少的地区，实现合作化需要更多时间。

在这次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说，土改和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同农民结成并巩固了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这次会议一结束，毛泽东立即部署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

七届六中全会后，各方面开展“反右倾”，助长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12月5日 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加强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对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

1956年2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会议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

4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其主要内容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提出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三个方面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要给生产单位一定的独立性和权益，要关心群众生活，特别要使工人、农民在增产的基础上增加收入。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提出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中国和外国关系问题上，提出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它的长处，要学习它的长处，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理的方面。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毛泽东说，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废止土葬、实行火化的建议，提议自愿签名。在这篇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按照签名顺序，签名的还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 136 人。

8月22日至9月13日 中共召开七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和通过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

建议的报告。

全会决定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8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讲话。他说，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因为没有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1956年是400多万吨；1957年可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9月15日至27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选举毛泽东、刘少奇、林

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等97人为中央委员，选举杨献珍、王思茂、杨得志等7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9月28日 中共举行八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1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6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政治局常委6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刘澜涛、萧华、王从吾、钱瑛、刘锡五。

11月10日至15日 中共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出席的有中央委员84人，候补委员65人。中央和地方、军队的负责人147人列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刘少奇作《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发展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明确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陈云作了《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对于改善粮食的收购工作和销售工作，对于增加猪肉和食油的生产，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也讲了话，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

是进，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还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

1957年5月8日 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他本人是否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作如下发言：毛主席还是党的主席，还是国家的主席，还是国家的领袖。我们希望他健康长寿，但人总归是不能违背生命规律的，总是要见马克思的。我们要考虑的，是他在余年做什么事情好。主席讲的是对的，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是对中国很有意义的事情。

9月20日至10月9日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会议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主要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 and 具体部署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10月9日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还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毛泽东还充分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即所谓“四大”。他说，今后“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此后，“四大”广泛运用于各种斗争之中，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8年1月3日至4日 中共中央召开杭州会

议。主要讨论了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以及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两次讲话。关于经济建设上的领导方法问题，他说，要在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区域，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普遍搞试验田。今后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但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政治思想革命的同时，着重搞好技术革命。政治与业务不能脱离。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政治业务要结合。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要批评右倾保守。

2月13日至2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规定以后不得再提“反冒进”的口号。

3月9日至26日 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和《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等37个文件。会议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把冒进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把反冒进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会议确定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作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毛泽东的讲话还包括以下内容：(1)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特别是工业和计划方面照搬苏联的经验和一些管理制度，产生了教条主义。在建设路线上不能迷信苏联，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独创精神，敢想敢说敢干。(2) 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3) 要研究平衡问题。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要提倡实报，诚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4) 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5)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不正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

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3月21日 中共中央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问题的意见》，并于4月2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作为中发[58]243号文件下发执行。该文件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为了适应农业、地方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大跃进”，根据中央改进行政管理体制的精神，在某些省、自治区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适当地扩大专署权限。(1) 建立专区财政。专区级的企业、事业、文化教育和行政管理等正常开支，由专区所辖企业、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中解决。不足部分，由省划税和拨款补助。划税和拨款的比例，在确定以后，在几年内以不变为宜。(2) 专署对所辖县市的财政预算执行可以作必要的调剂。(3) 原由省人民委员会委托专署管理的企业、事业和中等学校，划归专署直接管理。(4) 根据地方工业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兴办适合于专区管理的企业，建立中等技术学校和工业、农业的科学研究机构。(5) 专区范围内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物资分配计划，由专署编制汇总，并可根据执行情况，在本区内作必要的调剂。(6) 专区范围内的人员编制，在省控制的总指标内，专署可以在地区间和部门间作必要的调剂。第二，为了使工农业便于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每一个专区应有一个工业城市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为此，各省、自治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将省、自治区直辖的若干中等城市委托专署领导，并相应地对地委和专署的领导成员作适当的调整。

5月5日至23日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刘少奇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邓小平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谭震林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

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会议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并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高指标。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会议再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在会上发言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他号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要求干部扫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反对靠老资格吃饭，靠做大官吃饭，要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他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事后，中央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设计机构，拨出专款，研制人造地球卫星。关于经济发展，他说如果5年达到4000万吨钢，可能7年赶上英国。再加上8年就能赶上美国。他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认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并提出要插红旗，辨风向，把白旗拔掉。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5月25日 中共举行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出版党中央理论半月刊《红旗》，由陈伯达任总编辑。《红旗》创刊号于6月1日正式出版。

8月17日至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会议主要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

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估计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90%，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将达到1000斤左右。这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因此，决定各省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必须首先注意对工业的领导，但同时不应放松对农业的领导。会议认为，工业的中心问题是钢铁的生产和机械的生产，而机械生产的发展又决定于钢铁生产的发展。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增加一倍而奋斗。会议于8月28日作出《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决定1959年粮食达到8000亿斤到10000亿斤，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机床、发电量、煤、棉等产量均有大幅度增长。基本建设投资将为500亿元。在此基础上，准备在1960年使粮食产量达到13000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5000万吨左右。经过1958、1959、1960年的3年苦战，再加上此后两年，到1962年完全可能使粮食产量达到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至1亿吨。即在“二五”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会议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则说，到1962年，全国就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全国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就能接近美国，在主要科学技术方面就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8月29日，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建立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说，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目前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建成联社。自留地、股份基金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决议》说，建立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成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